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谢 贵 安

[摘要]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吸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宋实录;史料;来源;流向

[中图分类号] K244-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4-0423-06

《宋实录》属于已佚实录,对它的关注相对较少,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争议较多的《神宗实录》上面,如胡昭曦《〈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以及孔学《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①等均对《神宗实录》的修纂与党争的关系作了考察。其它实录的研究,似只有燕永成《关于宋太宗实录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及蔡崇榜在《宋代修书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宋实录》修纂情况的涉及。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有燕永成《〈宋朝要录〉考略》对《宋朝要录》一书与《宋实录》关系的讨论^②,认为前者所载内容多来源于宋代《实录》,疑为《实录》之脱本。然而,系统地对《宋实录》的史源与史流进行探讨的论著,尚未多见。故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较详细的探究。

《宋实录》是宋代官修系列史书,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以上北宋9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以上南宋5朝)共14朝实录。像所有亡国之君一样,度宗以及其后的恭、端二宗均无实录。《宋实录》属于“编年附传”的实录体史书,是当时最大的官史类著作之一,《宋实录》共为2999卷。元苏天爵曾称:“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③(卷25《杂著·三史质疑》)再加上《理宗实录》,肯定超过3000卷,而整个宋修纪传体《国史》也只600卷,仅为《实录》的1/5。

一、《宋实录》史料来源

(一)官方原始档案及文献

作为官史史料的汇总,《宋实录》首先来源于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和文献。

中国自唐代以来便形成了《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即注重保存诏敕、奏疏、公文等档案文件,作为修纂《实录》的基本史料。《宋实录》是宋代列帝事迹及朝政的重要大典,它的史料储备受到极大关注,自真宗始宋廷便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较为严密的制度作为保证。至道三年,奉诏修纂《太宗实录》的史官钱若水等请求“于前任见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使、三司使等处移牒求访(有关君臣决策的档案),以备阙文”^④(卷18),得到批准。从此,宋朝的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获得确立。陆游曾回顾了真宗朝修纂《太宗实录》和重修《太祖实录》时,因有完善的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而修纂效率大大提高的事

实,并指出关键的原因在于史料储备与供应制度的完善^③。史料源源不断地流入史馆,因此两朝《实录》皆得以在9个月之内告成。

《宋实录》修纂的原始史料的储备制度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皇帝、太上皇的诏令、事迹得到保存并向实录院提供。皇帝的诏令常被编集成《御集》,并提供给实录院作为修纂实录的档案材料。绍圣间进呈《神宗实录》时,哲宗曾下一诏,被编进《哲宗实录》,“《实录》盖用《御集》所载正月十九日手札”^[3](卷520,哲宗元符三年正月丁亥)。有些诏书则直接付实录院修史。刘挚等曾要求哲宗“降一诏书,辩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实录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论”^[3](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同时,皇帝或太上皇的事迹也被记录下来,提交实录院修史。如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实录院”^[3](卷43)。

其次,大臣的奏疏也按例提供给实录院,作为《实录》取用的重要史料。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得实录院牒”,要他提供在“太宗朝所上谏疏”,于是他“写录”了一份,“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3](卷43,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以备修史。仁宗朝,修纂《真宗实录》时,也取用了大量的机密档案,包括宰相王旦荐用人才的奏疏。哲宗元祐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叟为韩琦和欧阳修定策立英宗之功,上疏驳斥那些攘为己功的人,并要求“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以成信史”。接着,韩琦之子韩忠彦针对王同老提出立英宗的定策功是其父王尧臣一事,担心“由此是非杂揉,寢失本源,倘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因此请求宣仁太后,“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他的这本奏疏后收录于《哲宗实录》元祐二年三月中^[3](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由以上记载可知,大臣的奏疏有交付实录院以备修《实录》之用的制度或惯例。

其三,实录的史料储备制度还包括从“四方万里郡国之远”的府县地方调集方志、墓志、行状等史实,由史院“行下诸州索行实、墓志之属”,由“运司专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运司”^[4](卷107),逐级进行。南宋朱熹也建议“以合立传之人,列其姓名于转运司,令下诸州索逐人之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后有可下笔处”。

《宋实录》便是在这样的史料储备及提供制度下,源源不断地获得档案和文献资料。

(二)宋代史料性史书

除了原始史料外,《宋实录》史料的另一大来源,便是稍加整理的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以及在此二书基础上编撰成的二级史书《日历》。无论初级史书还是二级史书的修撰,均属于《宋实录》修纂工程的史料储备制度的组成部分。

宋代的两大史料性初级史书之一是《起居注》。张昺曾指出:“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3](卷35)这说明,《起居注》是以《宋实录》编纂为目的。为了向《实录》提供史料,宋朝建立了《起居注》的记注制度。早在太祖和太宗时,“以起居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官”^[3](卷15,《制作》)。淳化五年,张昺提出“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的建议,太宗览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3](卷35,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宋神宗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将起居注官制加以正名,革去原来的寄禄官,而正式确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为记录皇帝言动的官员:“制行,复为郎、舍人。”^[5](卷15,《制作》)南宋时,彭龟年在其上奏中反映了当时《光宗起居注》的记注情况:“臣窃见《起居注》,每于车驾过宫(看望太上皇)日分,必书‘某日车驾诣重华宫、慈福宫起居’。如不出,即书云‘恭承寿皇(即太上皇赵构)圣旨免到宫’。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书。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书几三十次。”此奏表明,当时起居注制度一直存在,并发挥着记注的作用。由于《起居注》是《实录》的史料基础,因此对君主圣德隆污的历史记录具有决定性影响。宋代的起居注还负责将大臣与皇帝秘殿独对和造膝之语记录下来。

宋代另一大史料性初级史书是《时政记》。它是由宰臣撰述的有关高层决策和官吏任免的记录。早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便建立了由中书枢密撰写《时政记》以授史官修纂《实录》的制度。据《真宗实录》记载,“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枢密院始置《时政记》,日终送中书,用王文穆、陈文忠之请也。大中祥符

中,又命直送史馆。”^[6](卷1)欧阳修指出:北宋初“有两府之臣撰《时政记》”,但“近年以来”的《时政记》,“员具而职废”,“惟据诸司供报”修纂成政府官员任免的“除目辞见之类”的公告。他建议令修《时政记》之臣,不仅根据诸司供报编次成册,而且要对事实加以考证。宋代《时政记》的编纂是以修纂《宋实录》为最终目的。元祐四年八月,范祖禹负责修纂《神宗实录》时,指出宣仁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的“圣语”,“合详书于《时政记》以传万世”,但枢密院所记圣语,“安焘却不签书,至今收藏不出。若不书载,则他日无所信”。故要求太皇太后遣人于安焘处“取索元记圣语文字,降付枢密院,令书入《时政记》,并乞付实录院,令书于元丰八年《实录》”^[3](卷431)。南宋时,《时政记》的修纂制度仍然存在。当时不同部门修有不同名称的《时政记》,有《三省宣谕圣语》、《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等,并成为《日历》修纂的史料:“凡修《日历》照用文字,《三省宣谕圣语》(初名《时政记》,乾道七年改为《宣谕圣语》),宰执编次进入,或一两月,或半年,降付《日历》所。《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宣谕圣语》亦如之。”^[7](第39页)这各种《时政记》是修纂《日历》的照用文字,而《日历》则是以《实录》修纂为最终目的。

《日历》是建立在《起居注》和《时政记》两大初级史料性史书之上的二级史料性史书,是《宋实录》修纂的直接史料来源。北宋张昞《上太宗乞复左右史之职》建议“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备修《日历》”^[8](卷60《百官门·史官》)。这与前引汪藻的话相印证:将《时政记》和《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可见,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6载,绍兴四年五月庚申,“诏日历所速行条具重修《哲宗实录》事件”。日历所所修的只是修纂《实录》用的“事件”。《南宋馆阁录》卷4《修纂上》载,乾道三年,洪迈奉命修纂《钦宗实录》。朱熹反复强调“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4](卷107)。意思是说《日历》是《实录》修纂的骨架,是最基本的史料。

宋代《日历》修纂制度比较完善,其修纂机构是日历所,初隶属于门下省编修院。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日历所归属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南宋绍兴元年,为修《(高宗)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由秘书省监、少监通行修纂^[9](卷164,《职官志四》)。宋代的《日历》代有修纂。仁宗时,欧阳修上《论史馆日历奏》,提出了改进《日历》编撰制度的建议,试图通过《日历》等史书的修纂,建立起一种由各部门配合的更加广泛的史料搜集和储备制度。然而,两宋之交,时局动荡,“三十余年,并无《日历》”。为此,绍兴间湖州知府汪藻主动请求“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10](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元符以来诏旨等书八百余卷,于《实录》最为有力”。王应麟指出:“汪藻纂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十盖七八。”^[11](卷48《艺文·实录》)由此可知,《实录》有时从《日历》采录的内容达到70~80%,说明《日历》是《宋实录》直接而主要的史料来源。

二、《宋实录》史料的流向

(一)宋修《国史》和元修《宋史》

作为宋代官史的一大总汇,《宋实录》在聚集了大量的官方史料后,又成为后人撷取的重要对象,从而使其史料继续向下游流动,构成一部部新史的史料基础。《宋实录》就像一个心脏似的泵站,将宋史史料的血液加压后输向布满全身的动脉、静脉和血管末梢。

《宋实录》最主要的下游史书便是宋朝所修的本朝纪传体《国史》。宋朝国史共有4部,即北宋《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南宋《四朝国史》。从唐朝以来,都是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国史》是在《实录》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宋代也是如此。绍兴二十八年八月戊戌,提举实录院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两天后,朝廷便决定动工修纂《徽宗国史》:“庚子,命尚书右仆射汤思退监修《国史》,权吏部尚书贺允中、中书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国史》。”^[10](卷180)宁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实录》成”至二日,便“修《高宗皇帝正史》《宝训》”^[12](卷20下)。可见《实录》先于《国史》(即正史)修纂,只

有《实录》修成,才有可能修纂《国史》。

《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录》的改编,从“编年附传”体改纂为纪传体。在改编过程中,删多增少,如《太祖实录》有50卷,《太宗实录》80卷,《真宗实录》150卷,三者相加为280卷,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总共只有150卷。而增加的部分主要在传记和志。仁宗、英宗的《两朝国史》共有“纪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实录》事迹颇多”^[13](卷1)。这里的“事迹颇多”是指人物传记。因为《仁宗实录》有200卷,《英宗实录》有30卷,两部实录共为230卷,远远超过《两朝国史》的120卷。宋代《国史》的修纂顺序是先本纪,后志,最后传记。这种次序与《实录》相关,因为帝纪和志容易从《实录》中取材,而传记只能从《实录》中移取部分,超过一半的传记还须另外搜罗史料,故修纂最迟。《实录》中的传记不能满足《国史》之需,因此才需要另外征集史事。其他史实,也有从《实录》以外的史书征集的,如宋宁宗开禧二年,国史实录院便征集费衮所撰《梁谿漫志》,据该书卷端所录国史实录院牒文称“编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书以备参考”^[14](卷121)。

尽管如此,《宋实录》仍然是宋朝《国史》修纂的基本史料来源。《国史》依赖于《宋实录》的先行修纂。史院编修李焘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这一修纂流程:“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倘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下笔。”又说:“《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趁成。”^[12](卷25上),充分反映了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的工作流程和史料流向。

在《宋实录》的史料流向《国史》之后,继续趋下流向元修纪传体正史《宋史》。一般认为,《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14](卷46),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但据阿鲁图所上《进宋史表》,其中并无以宋人《国史》为稿本的记载,只是说:元朝灭南宋时“收图书于胜国,辑黼黻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9](卷末附录),这里的“宋史”既可能是指宋代《国史》,亦可能是指《宋实录》。笔者以为应该是两者都包括。因此,除以宋代《国史》为据外,元修《宋史》还广采了《宋实录》的史料。也就是说,《宋史》同时也是以《宋实录》为史源的。笔者提出的证据是元修《宋史》卷210《表第一·宰辅一》的序:“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实录》为据,旁搜博采纪、传以为是表。”从《宋实录》到《宋史》的史料流程,既是“《实录》—《国史》—《宋史》”的走向,部分史料也呈现“《实录》—《宋史》”的流向。

此外,《宋实录》的史料还通过南宋淳熙间王偁所撰的《东都事略》,流向《宋史》。《东都事略》有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15](卷4,《制作》)。清人“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纪昀等“考之,惟《文苑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14](卷50)。既然《宋史·艺文传》取资《东都事略》,而《事略》又取资《实录》,因此,形成了“《宋实录》—《东都事略》—《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流程。

(二) 编年史和杂史

《宋实录》总汇而来的史料还不断地流向其它史书,成为这些下游史书的史料来源。

《宋实录》的编年性质,使其史料之流更多地趋向有关宋代的编年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作者李焘针对“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的情况,“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迹,荟粹讨论,作为此书”,史料多从《实录》中采撷而来:“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李焘长期担任《实录》的修纂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北宋列朝《实录》,因此该书取自《实录》的部分较多,自谓“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证明他是以《实录》为主体,而“阙略”的部分才“旁采异闻”的,仍以《实录》的史料为主源。

南宋佚名所撰《靖康要录》16卷,其内容是“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其史料就是撮录自《钦宗实录》:“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具有首尾,绝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此必《(钦宗)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14](卷47)。

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自称“侍从祖丞相正献公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音酷嗜之,独患管牒之繁,未是识其本末”,于是“删繁撮要为一书

以便省阅”。清纪昀等亦称“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14]（卷47）。陈均还撰有《皇朝编年备要》（《九朝编年备要》的一部分）和《中兴编年备要》二书，皆以《实录》等史为其史料来源：“其书用《国史》、《实录》等书为编年体例，起于建隆，迄于淳熙。书法盖微仿《纲目》之例，而加斟酌焉。”^[13]（卷5上）“宋末山林之士”所撰《两朝纲目备要》，叙“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是“续陈均《宋编年》”而成，“本《（光、宁）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14]（卷47）。

高载所著《通鉴巨编》也是从《实录》等史籍中取材的。他“以其暇览前朝史牒，叹熙丰祐圣迄于隆乾淳熙党论屡变，国势儆起不常，慨然有感，乃取制词之褒贬，廷论之是非，萃成巨编，而自以己意识其后。大抵以《国史》、《实录》、《长编》、《会要》为之据依”^[15]（卷92，《著作记第二·史部》）。

除了流向编年史外，《宋实录》的史料还流向有关宋史的诸多杂史。所谓杂史指上述国史、正史、编年以外的其他史体，如别史、传记乃至笔记小说等。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监修国史王曾提出仿《贞观政要》形式撰一本宋朝的类似著作：“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3]（卷105）。这是《实录》史料较早的流向别史的例子。

南宋高、孝间人王楙所撰《燕翼诒谋录》5卷，也曾从实录中撷取史料。书中自序谓：“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上起建隆，下迄嘉祐，所采凡一百六十二条，皆祖宗良法美政可为世守者。”^[16]（卷163，《经籍考·杂史》）清纪昀等人称：“自序谓悉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今观其牖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灿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14]（卷51，《史部杂史类》）可见，杂史之杂，亦有《实录》之一份在内，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为“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

北宋仁、神间司马光所撰《温公日记》，以及《涑水记闻》和《朔记》，是司马光熙宁间在朝所记的有关朝廷政事、大臣差除、前后奏对，此三书当为《实录》的史流。

传记类著作如《建隆遗事》1卷，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有著录：“近取《实录》，入禁中，亲自笔削。”另一部传记类著作《言行拾遗事录》4卷，“记范仲淹言行事迹，为《行状》、《墓志》所未载者，故曰拾遗。大抵取诸《实录》、《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诸书，而说部之可采者亦附列焉。”^[14]（卷59《传记类存目》）看来，这也是部分取材于《实录》的史著。

光宗时蔡幼学所撰《国史编年政要》40卷、《国朝实录列传举要》12卷、《皇朝宰辅拜罢录》1卷、《续百官公卿表》20卷四书，也是《宋实录》的史料之流。此四书乃其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时，利用职务之便从《实录》中摘抄而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史、正史、编年和杂史，在接受《实录》的史料之源时，也吸纳了其它的支流性史料。如《温公日记》“事亦有与《正史》、《实录》不同者”。前述《续资治通鉴》也是自《实录》以外，“官府文书”和“家录野纪”均在采纳之列。这说明，上述史书虽为《宋实录》的史流，但也接纳了其它条条支流。

宋代《实录》的史料来源于原始记录和初、二级史料性史书，成为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然后继续为史流性史书所采掇，成为有关宋代《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的史料来源。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原湖泊，承接雪峰融化的涓涓细流，经过汇集和蓄势之后，向下游奔涌而去，成为穿行在较低地势中的河流之源。弄清《宋实录》的这种承前启后的地位，无论对其本身还是对于宋代历史，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学术价值。时至今日，已佚的《宋实录》虽然像罗布泊一样消失了，但它的史料却早为众多的宋史著述所吸纳和采入，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宋朝的重要历史信息。《宋实录》的史料学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注 释：

① 参见胡昭曦：《〈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孔学：《王安石〈日记〉与〈神宗实录〉》，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参见葛永成：《关于宋太宗实录的若干问题》，载《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蔡崇禧：《宋代修书制度研究》，台北，文

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燕永成:《〈宋朝要录〉考略》, 载《史学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 ③ 关于宋朝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 史界多有论及。详见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参 考 文 献]

- [1] 苏天爵:《滋溪文稿》,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2]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3] 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4] 朱 熹:《朱子语类》,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5] 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6] 李心传:《旧闻证误》,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7] 陈 騏:《南宋馆阁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8] 赵汝愚:《宋名臣奏议》,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9]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1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11] 王应麟:《玉海》,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12] 《宋史全文》,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13] 晁公武、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14] 纪 昀等:《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15] 曹学佺:《蜀中广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16] 嵇 璜等:《续文献通考》,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

The Historical Data Source and Course of “The Veritakle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Xie Gui'a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Veritakle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is a big confluence of Song Dynasty official historical data. It picked and used official primitive files of So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primary historical book “Record of the Emperor’s Daily Activities”, “Recorder of Current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levels of historical books “Diary of Song Dynasty”, carried on compili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ormed the most important meanwhile giant official historical work of Song Dynasty. After that, the Song Dynasty “National History”, “Song History”, annals, unofficial histories picked and used its data in order to become the courses of historical data of “The Veritakle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The Veritakle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became the source of official historical data of Song Dynasty, played the vital role which linked the preceding with the following.

Key words: “The Veritakle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data; source; course